

浙江文叢

劉一止集

〔上册〕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劉一止集  
〔上冊〕

〔宋〕劉一止著 龔景興 蔡一平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一止集 / (宋)劉一止著;龔景興,蔡一平點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3  
(浙江文叢)  
ISBN 978-7-80715-854-7

I. ①劉… II. ①劉… ②龔… ③蔡… III. ①古典詩  
歌—詩集—中國—宋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宋代  
IV. ①I214.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54254 號

## 劉一止集

[宋]劉一止 著 龔景興 蔡一平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http://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錢偉彊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張 41

字 數 420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715-854-7

定 價 220.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ISBN 978-7-80715-854-7



9 787807 158547 >

## 點校說明

劉一止（一〇七八—一一六〇），字行簡，湖州歸安（今湖州）人。徽宗宣和三年（一一二二）進士，監秀州都酒務。秩滿，遷為越州州學教授。建炎四年（一一三〇），為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元年（一一三一），召試館職，同年冬，遷監察御史。紹興二年七月，遷起居郎。八月，被罷為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四年四月，復召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奉祠温州神主。未行，改權發遣袁州，同年十一月，除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兼提舉本路常平等事。次年加直顯謨閣，知常州。紹興八年九月，除祕書少監。十一月，復起居郎。紹興九年二月，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同年九月，除給事中兼侍講。僅過三月，貶為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十年二月，復為祕閣修撰。紹興十五年十二月，落職。紹興二十二年七月，再除祕閣修撰，不久以疾篤告老。同年十月，又除敷文閣待制致仕。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復落致仕。次年四月，除敷文閣直學士。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初四，病逝于家中，終年八十三歲，去世後獲贈左朝散大夫。

劉一止生活在南北宋交替之際，此時社會動蕩、時局不穩，也注定了他的經歷必然是複雜坎坷的。劉一止中年始得進士為官，官場生涯可謂是跌宕起伏，幾起幾落，命途多舛。劉一止

長期爲官從政，在朝內朝外都產生過一定的影響，是一位極富抱負的政治家。其自幼聰慧勤學，爲文、爲詩、爲詞典雅而自成一派，抒情、寫意別具風味，寄意深遠，備受時人關注，更爲文人雅士讚賞歎絕，是一位卓有成績的文學家。

劉一止爲官，以盡心盡職爲己任，無論身居何位，都不敢有絲毫的懈怠。紹興元年，劉一止入試館職，向上極陳當世之務，對策提出：『天下之事，所以不克濟者，患在于不爲，而無患其甚難，故聖人畏無難而不畏多難，以其困難而能圖也。』（《試館職策》），向執政者提出了處理國事之遠見，得到了皇上的贊許，但終因不討當權者的喜歡而被冷落。同年在監察御史任上，劉一止更是勤于『討論時政，指陳闕失』。其《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詳論君子與小人對國家政事的影響和作用，認爲『君子雖衆，其道則孤；小人雖寡，其勢則蔓』，作爲當政者既應該明察何爲君子、何爲小人，更應該『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其《論人主不憚改爲》，援引前朝事例，分析當今形勢，認爲現在正是『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的時候，要達到『謀無遺案，事靡不濟』，就必然『機變敏速，不憚改爲』，只有不斷地調整治國之策，方能實現富國安邦的目的。劉一止在仕途上敢于直接向最高統治者大膽進言，直顯無畏無懼之本色。時宋朝隅守江南，國不寧定，政事繁亂，加之金人時時南犯，朝中主戰與議和之爭劇烈，劉一止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展現他的個性和才幹，也表達了他爲君分憂的拳拳之心。

在劉一止的政治生涯中，關於他與秦檜之間的關係，史料上各種說法不一，劉一止幾次被

貶官，實際上都與秦檜有關，但對其中緣由的記載却是截然不同，分別有『檜黨』與『忤秦』之說。點校者以為，應該根據劉一止從政前後期的不同遭遇來分析，在任起居郎以前，是秦檜同道中人，却也因秦而落職；紹興四年之後，又屢次遭秦檜嫉恨而不被任用。劉一止任監察御史，自然有監察百官、巡視郡縣、糾正刑獄、整肅朝儀之職責，職權雖廣，然品秩不高，僅為八品官秩，其後任起居郎，主要負責記錄皇帝的言行，也無實權。而當時的右相兼知樞密院事的秦檜位高權重，秦、劉乃上下級關係，因為朝政需要，兩人時有接觸，劉一止的建議也經常被秦檜採納，故而《宋史·秦檜傳》有『監察御史劉一止，檜黨也』之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也直言劉一止是『檜黨』。事實上，劉一止本人立場的搖擺，也予人以『檜黨』印象。紹興二年（一一三二）秦檜奏請設置修政局，與參知政事翟汝文同時領職，而秦檜此舉實乃欲借機專權，翟表示不滿。秦、翟二人本來就是政見不合，矛盾頗深，曾經產生過激烈的爭執，秦檜向高宗彈劾翟汝文，翟憤而去職。劉一止為越州州學教授之時，其文才深為時任知州的翟汝文所賞識，兩人之間可謂是有憐才之交。劉一止曾向秦檜進言：宣王內修，修其所謂外攘之政而已。今簿書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建，俱非所當急者。（《宋史》卷四七三）對秦檜內外分治設置修政局等政事提出了不同看法，是下級對上級的進勸，而『檜皆不聽』，實際上是遭到了秦的反對，而後『有議廢局以搖檜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上疏言不可廢』，修政局三月後即廢，然劉一止前後自叛其說，故一時間被人恥笑，這種前後不一的態度確實招人疑慮。于是，此前被

秦檜支出朝廷而在鎮江置都督府的左相呂頤浩回朝後，劉一止等一千人均被貶出朝廷，劉一止出至主管台州崇道觀。關於這段經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七「高宗紹興二年八月壬子」條稱：「起居郎劉一止，起居舍人張燾……並落職與宮觀，皆坐秦檜為黨，為呂頤浩所斥也。」此記與《宋史·劉一止傳》所記有異，在起居郎任上，《劉一止傳》言其「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而遭罷免，基本上沿用了韓元吉《閣學劉公行狀》之說，據韓元吉狀文分析，此處的「執政」者應該包括秦檜等人。同樣是《宋史》，在本傳與他傳中，關於劉一止的評價却是截然不同，而顧吉辰《宋史考證》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對《宋史·劉一止傳》進行考辨後，認為劉是「檜黨」。韓元吉《閣學劉公行狀》是受託而作，對狀主難免多有溢美之詞，應該可以理解，但劉一止秉性耿直，事實上也無結黨營私之心，至少應該沒有附逆之意。

劉一止在任給事中之後不久就受到了秦檜的猜忌和打擊。紹興二年，劉一止從起居郎任上被免職，兩年以後為朝廷復召，在浙東路提點刑獄加直顯謨閣任上，他盡心庶獄，潛心理政，積極清理一些陳年舊案，為百姓主持公道，著力打擊強權。因為他大膽為弱者撐腰，斷案雷厲風行，深得一方百姓的擁戴，以至後來有人「畫像以祠公」（韓元吉《閣學劉公行狀》）。任滿後，劉一止接連易職升遷，可謂深得皇上的賞識，紹興九年升任給事中。而從九月十四日除給事中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再次被罷，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天時間，劉一止連連上奏，積極議論朝

政，凡朝廷之事，無論貴近，論奏不已。其奏罷池州知事徐偉達、罷外戚孟忠厚、減宣州知事汪伯彥俸祿等等，都為高宗採納，甚至改正了許多已在動議中的詔勅。由于劉一止的勤勉上奏，也使得其他一些諫官無事可做，其時為中丞的廖剛就對其屬下說：『臺當有言，皆為劉公先矣，我等獨無愧乎？』劉一止在審讀文書過程中，不斷地駁正政令，進奏諫言，不可避免地受到『用事者』的嫉妒和不满，同時更為被奏者所痛恨。因此，很快就被人誣告，被奏為『舉薦呂廣問』時所據失實，並稱依附李光，怠慢皇上，被降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而置閒。此後幾年，又是反復被起用或降職，終無實質性的權力。『紹興』二十五年，用事者死，上更嫩庶政，即起公赴行在』（韓元吉《閣學劉公行狀》），而秦檜即死于當年，此『用事者』即為秦檜，『用事者』死後，劉一止復被召用，但因年邁體病而力辭。而《宋史·劉一止傳》更是明確記載：『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秦檜死後，劉一止被『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因此，劉一止與秦檜之間應該是因為政見不合而引起矛盾，形成了衝突，並最終直接影響了劉一止的仕途。

劉一止在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建設過程中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他曾多次擔任與司法刑獄有關的官職，始終主張法制要嚴明，執法要公正。他認為：『夫所謂失人心者，懼刑政之苛，虐賦役之狠，多失百姓之心也；懼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且失士君子之心也。』（《論人主力行果斷》）綱紀不振、民困財竭，必然會導致失去人心，而當朝失人心更具體的原因就是『刑政之



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宋室南渡之初，百事草創，律法混亂，政府司法竟然用吏人的記憶爲法度，從而導致執法者營私舞弊現象頻生，因此，他向高宗極陳時病之危害：「法令具在，姦吏猶得侮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或與或奪，在于其頰，其患可勝言哉？」他認爲恢復制度法令已經迫在眉睫，「改送詳定一司勅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爲急務」（《論尚書六曹及百司法令之弊》）。這個建議很快得到採納，一年之後編就相關的法律文書，爲朝政的有序司法提供了保證。

劉一止自幼就蘊露了不凡的文學天賦，他七歲就能寫文章，「命賦詩，操牘立就，語奇出」，入太學考試，屢屢優于他人，未成年時以文才、忠孝聲名在外，深得時人的贊賞。而劉一止却淡泊功名，力行個人的修爲，有人欲舉薦他人入行科，可以入太學，免試補爲上舍，從優授官，他則認爲：「行者，士之常也。」辭謝不就。宣和三年，登進士第，「廷中少年朋遊多已貴且顯，至公名莫不舉笏相慶，公視之泊如也」，表現出了鎮靜自若、不以物喜的品格。劉一止在官場上幾起幾落，得意不驕，失意不餒，每次遭貶之時，則以吟詩作文抒寫胸臆，而非怨天尤人。如紹興二年八月被罷起居郎而寓居德清僧舍時，便把貶官當作修行，「杜門却掃，自放于山水」，潛心于吟詩作詞，也可謂是心境坦然。這一時期他的詩文創作收穫甚豐。

劉一止詩自成一家，深得同時代詩界的好評，呂本中、陳與義讀了他的詩後認爲，劉一止詩「語不自人間來也」。其同鄉、時任知樞密院事的文學家沈與求（浙江德清縣人）與他交往

甚厚，沈與求對劉一止清新自然的詩風贊譽有加：「劉郎天韻真不凡，飛騰宜在蓬萊島。」（沈與求《劉行簡見借詩稿以長句歸之》）

劉一止《訪石林》詩：「山竹不用瘦藤扶，度石穿雲意自徐。夜過西巖投宿處，滿身風露竹林疏。」就是反映其詩風的代表之作。該詩通過描摹詩人拜訪好友葉夢得石林精舍途中所見之景，借景抒發輕鬆自然的心情。「意自徐」竟來自山行時的「度石穿雲」，在冒着清風霜露的夜色中，那種林影晃動、漏月滿地的情境無不是醉人的美景。葉夢得與一止交遊較多，對劉一止的為人處世也十分欣賞，在議論當今傑出人物時，他以一止為「第一流」，論其詩亦極為歎服，至稱：「世間久無此作矣。」

劉一止善于託物言志，為人直爽，為官公正，在再次遭受貶謫打擊之後，他並不因此而尋求改變自己的稟性，其《小齋即事》即為直白寫意之作：

憐琴為絃直，愛棋因局方。未用較得失，那能記官商？我老世愈疏，一拙萬事妨。雖此二物隨，不係有興亡。

他以琴棋二物之「品」，寄寫自己不改初衷之「志」：琴絃直以寓個性之正直，棋局方以表為人處事有棱有角。取物寄情，信手拈來。正因為自己的方直之品不變，結果到頭來「世愈疏」、「萬事妨」，只落得小齋獨處，表面上無關乎國家的興亡，內心裏則憂心憂國。那種對個人遭遇的感慨、對世事憂患的情懷袒露無疑，此詩構思巧妙、別開生面。

他的《冥冥寒食雨》詩也意境渾成、寓意深遠：

冥冥寒食雨，客意向誰親？  
泉亂如爭壑，花寒欲傍人。  
生涯長刺促，老氣尚輪囷。  
不負年年債，清詩斷送春。

字裏行間，無一字直白思鄉念親，然而那有生命、有感情的寒食雨、傍人花，無不寄託着深沉的懷思之情，首句反詰之語，使得情意更重。劉一止遣詞造句善于抓住字眼，寒食之雨、泉邊之石、花傍之人都已經融成一體，人、花不辨，雨也不只是淅瀝纏綿，而是滋潤着萬物，磨練着萬物，表達出一種頑強、樂觀、純真、靈動之氣。

劉一止還善作趣詩，其偶作一首拆字詩爲《志士心未已》，用語機警，蘊意妙趣橫生，實爲詩中雅趣小品。詩云：

日月明朝昏，山嵐自起。  
石皮破仍堅，古木枯不死。  
可人何當來，意若重千里。  
永言詠黃鶴，志士心未已。

詩人極善借用漢字特殊建構，日月爲明、山嵐成嵐、石皮爲破、古木即枯、可人作何、千里成重、永言爲詠、士心成志，巧妙構思，既爲文字遊戲，又借詩寓意，充分展現其擅長描繪自然景色，抒發內心情懷的才氣。此詩讀來通達順暢，意蘊一氣呵成，予人以清新通透之感，尤其是末句『志士心未已』又以詩言志，表達永遠不息的報國之心，實是妙筆。

劉一止的長短句在詞壇上影響更爲深遠。韓元吉《行狀》云，劉一止『樂府亦盡在其妙，

京師市人鬻者，紙爲之貴』，能夠做到『京都紙貴』，想必古今文壇上也沒有幾人。劉一止詞意境高遠、情景交融，非常善于借景抒情，一首《喜遷鶯·曉行》就足以讓他聲名遠揚：

曉光催角，聽宿鳥未驚，鄰雞先覺。迤邐煙村，馬嘶人起，殘月尚穿林薄。淚痕帶霜微凝，酒力衝寒猶弱。歎倦客、悄不禁、重染風塵京洛。追念，人別後，心事萬重，難覓

孤鴻託。翠幌嬌深，曲屏香暖，爭念歲寒飄泊。怨月恨花煩惱，不是不曾經著。這情味，望一成消滅，新來還惡。

上半闕，詞人以冬日的一個凌晨爲特定時間點，遠行人凝淚惜別親人，那種難以割舍的情懷湧上心頭，又寄託於眼前的一景一物，曉光、號角、宿鳥、鳴雞、煙村、嘶馬、殘月、淚痕、濃酒等等，件件寒心，事事傷神，無不令人斷腸。可以與溫庭筠的『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相媲美。下半闕寫人別後之萬重心事，又無從傳達，深閨佳人的無盡遙想與詞人飄泊流離的寒酸生活並提，更是表達出厭煩了行旅生活的遠行倦客的內心世界。該詞前繪拂曉時行途景色，後寫懷人心境，前因後果，情景水乳交融，結合得精彩傳神。劉一止寫景善于抓住字眼，以『煙』點晨霧，以『霜』點曉行，動靜有致，許昂霄《詞綜偶評》評曰：『宿鳥』以下七句，字字真切，覺曉行情景，宛在目前，宜當時以此得名。』先著《詞潔》亦云：『前半曉行景色在目，雖不及竹山之工，正是雅詞。』此詞其時盛爲流傳，『劉曉行』雅號因此而生。

劉一止年輕時作詞則更顯一股豪邁之氣，《踏莎行·遊鳳凰臺》一開頭『二水中分，三山

半落』，借李白《登金陵鳳凰臺》『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言簡意賅，引出『風雲氣象』之意境，抒發少年通透遼闊之胸懷。『六代豪華，一時燕樂。從教雨打風吹却。』感歎歷史的無情，歲月的流逝，但傷感之情只是一閃而過，『與君攜酒近闌干，月明滿地天無幕』，在那個月明星稀的晚上以酒壯情，舉杯暢飲，憑欄閱景，那種無比暢快的心情一覽無餘。

劉一止曾因被誣袒護李光而遭貶，《宋史》云，李光『忤秦檜意乞去，改提舉洞霄宮，謫昌化軍』，劉一止與李光同懷報國之志，對秦檜等當權者的誤國之惡深懷不滿，對李光的遭遇深表同情。在李光赴任路過嚴子陵釣臺之時，劉一止前往送行，李光作《水調歌頭·兵氣暗吳楚》致意，劉一止旋作《水調歌頭·和李泰發尚書泊舟嚴陵》回贈，『北望旄頭天際，殺氣遙昏楚甸，雲樹失青蒼』，那種為國家命運處于危難而焦急的情緒袒露無遺。同時，面對失意的好友，他又是故作輕鬆地予以勸慰，『醉人無何境界，却笑昔人底事，遠慕白雲鄉』，上下片強烈之反差，更顯詞人意味深長之憤懣之情。

劉一止為文更為人所稱歎，其文思維縝密，用詞遣句均經過深思熟慮，『為文章推本經術，出入韓、柳，不效世俗纖巧刻琢，雖演迤宏博，而關鍵嚴備』（韓元吉《閣學劉公行狀》）。劉一止一生作了大量的制誥、策論、墓銘等文，無不出于精心製作，繁簡有致，極善于傳情達意。

在起居郎任上，劉一止勤勉從政，僅在任百日，即已製作大量的制誥，出手之快，令人刮目。『其為制誥，明白有體，麗而不侔。雖書詔填委，一日數十，倚馬輒辦』（韓元吉《閣學劉公

行狀》），官差不用下馬，立等詔書，實爲奇事也。劉一止所作『外制』不徒爲詞藻華麗，虛情溢美，只求文辭達意，因此不僅普通百姓爭相傳誦，就連當朝皇上都曾經『歎贊不已，至手書之』，可見其文才之高。

劉一止撰作墓銘主張銘以載道，提倡抑惡揚善。雖然經常只是選取記銘人物的生活瑣事，但是善于擷取生平經歷中的典型細節，以小見大，展現人物的精神風貌，頌揚他們的品德亮點，寄託族人的內心感情。他創作的墓誌銘盡棄爲銘過譽之弊，義近于史，語不虛浮，融叙事、說理、言情于一爐，含情于銘，情深意遠。體例上也不拘一格，因事設體，語言簡練幽雅，文采斐然。故一時之間，『鄉人士大夫葬其父祖，得公志墓乃以爲榮』，鄉人有求，劉一止都是暢快應承。

劉一止爲人耿直，生活節儉，處事光明磊落、生性樂觀無憂，故一生坦蕩，深得時人的敬重，言行舉止又極具長者風範，指教後進、業傳晚輩均有所成。他曾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教誨子女：『吾平生通塞，聽于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韓元吉《閣學劉公行狀》）無欲無求，乃爲人生最高境界，正是他的這種沖淡寡欲的情懷，方使他在失落之時能够寄情于詩文、遊戲于翰墨而自樂。

劉一止一生作詩文之數量可觀，在其晚年已經結集刊行，集名爲《非有齋類稿》，但是傳于後世者均稱爲《苕溪集》，乃其子劉巒所添改易名而沿用者也。

韓元吉《閣學劉公行狀》云，劉一止『有《類稿》五十卷，藏于家』。《宋史·劉一止傳》也爲『有《類稿》五十卷』，《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六十六則引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非有齋類稿五十卷』，並注：『陳氏曰：給事中吳興劉一止行簡撰。宣和三年進士，居瑣闥僅百餘日，忤秦檜罷去。閒居十餘年，以次對致仕。檜死，被召，力辭，進雜學士而終，年八十二，實紹興庚辰。』

《宋史·藝文志》則記『劉一止《苕溪集》五十五卷』，而韓元吉之子韓澆《澗泉日記》云：『先公出入其門，爲作行狀，號《苕溪先生集》，刊行于世。』

從以上可見，名《非有齋類稿》者爲五十卷本，見于《宋史》卷三七八本傳，及韓元吉《行狀》；名《苕溪集》者爲五十五卷本，首見于《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後者多出五卷，在其《中卷五二》『雜著』末，有其子劉巒題記：

右二文乃先公八十三歲時作，嘗語子孫：『此文入石，吾不及見矣。』是年季冬捐館，如前云，故表于此卷。孤巒泣血謹書。

以此推斷，所增五卷應均爲劉巒輯補，而從劉一止與子孫語中可知，《非有齋類稿》當爲其生前已經編就，因有遺文未收，故有『此文入石，吾不及見矣』之說，先有《類稿》，後爲《苕溪集》。因《苕溪集》哀集更全，刊行也更晚，故更容易流傳，以至今見均爲《苕溪集》，而未見《類稿》原本。

從《宋史》可見，《苕溪集》刊本宋代已經行世，而從後代各種書目來看，元明兩代均無新刊本，見于書目者應仍為宋本。有以下書目著錄：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卷九：『劉行簡《苕溪集》一部十二冊，全。』

明張萱《內閣書目》卷二：『《苕溪集》十冊，全。……凡五十五卷。又十一冊，全。』

明葉盛《菴竹堂書目》卷三：『《苕溪集》十二冊。』

明李鶚翀《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苕溪集》五十五卷。』

明末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卷三：『《苕溪集》五十五卷。』

至清代，已經不見宋刊本流傳，書目所記均為影宋鈔本，據祝尚書《宋人別集叙錄》考證：『今大陸各圖書館著錄清鈔本凡十七部，臺北「中央圖書館」舊鈔本二部，皆為《苕溪集》五十五卷。』《四庫》採用的為鮑士恭家藏本，《提要》云：『前有曝書亭印記，蓋朱彝尊家舊鈔。』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九亦云：『世之傳鈔，皆本于朱氏曝書亭。』各舊鈔本于卷七均脫詩二十一題三十三首，行格均為『每半葉十行二十字』，可見各本均同出一源。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朱祖謀得丁丙之傳鈔本，由沈耀勳（杏野）付梓刻印刊行，為今存唯一之刊印本。該本每半葉十二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雙邊。因脫漏訛誤極多，傅增湘于一九二六年用璜川吳氏舊藏鈔本對校補遺，改補、佚語、訛字達六八九字，並作《苕溪集校本跋》記述。



《苕溪集》全書主要包括詩、文兩大部分，詩、賦、詞的篇幅僅占六分之一，分量不多，但是十分精緻。而文的篇幅約占六分之五，體式與內容都相當複雜，其中就包含了講義、劄子、策、策問、書、奏狀、故事、表、啟、記、諭詔、銘、疏、偈、箴、銘贊、疏語、祝文、題跋、啟狀、致語、青詞、祭文、行狀、外制、墓碑、墓銘等等多種體式，從內容來看，也是相當廣泛，涵括了劉一止的政治、經濟、軍事、人文理念與哲學思想。詩以言志，文以記行，許多詩文都較真實地反映了他的生活經歷、交往與政治生涯，是後人瞭解和研究劉一止生平與思想最爲直接和可靠的材料。

劉一止詩文絕大部分已經收入《苕溪集》，另外，朱祖謀《彊村叢書》曾專門編有《苕溪詞》一卷，還有部分作品散見于《永樂大典》、《三朝北盟會編》、《歷代名臣奏議》、同治《湖州府志》及《兩宋名賢小集》等典籍之中。

本次點校選用底本爲綫裝書局出版之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原本爲國家圖書館所藏擁萬堂清鈔本（下稱「清鈔本」），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下稱「四庫本」）爲主要校本，偶有參考《三朝北盟會編》等文獻。清鈔本與四庫本兩者比勘，從頁面文字品質比較，四庫本鈔寫精良，而清鈔本較爲隨意。但是，從兩本的內容來看，四庫本出現的差錯、訛誤明顯多于清鈔本，特別是部分人名、固定詞常常因聲似、形似而誤，而考上下文關係或旁引其他資料相校，清鈔本正確率較高。特別是一些比較突出的錯誤是因粗心而致，如四庫本卷四八《宋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寧寨累贈太師秦國公楊公墓碑》自「星馳斛之」至「每從魏公」共計